

2014 年国际投资学综述

王碧珺*

提要：论文从5个方面梳理和评述了2014年国际投资国内外研究动态，包括如下议题：国际投资的决定因素，国际投资对母国的影响，国际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全球投资治理，国际投资的适度规模和国际投资的绩效评估。2014年国际投资领域的研究文献，呈现出在微观上更加细化，在宏观上更多重视制度变量影响的研究特征。

关键词：国际投资 制度 异质性 影响 治理

纵观2014年国际投资领域的研究文献，重点研究主题有5个：国际投资的决定因素，国际投资对母国的影响，国际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全球投资治理，国际投资的适度规模和国际投资的绩效评估。以下从5个方面详细介绍、梳理、总结和评述2014年的国际投资国内外研究动态。

一、国际投资的决定因素

国际直接投资研究的决定因素显著决定了企业是否在东道国投资，以及投资规模。这些因素既包括东道国的因素，也包括母国的因素。2014年的研究文献主要从不同的相对和绝对制度维度、企业异质性（主要表现在生产率上）以及空间依存等角度研究了国际投资的决定因素。

（一）制度

制度是国际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目前已有大量文献分析政府因素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区域差异的影响。这些研究主要基于省级FDI数据，研究的是省际间FDI差距，对于地市或县级等更微观层面的研究则较少。而且主要研究的是政府因素对FDI的数量区域差异的影响，对质量区域差异的研究则不够深入。冀相豹（2014）^①利用中国286个地级城市2005—2010年的面板数据，参考蒂布特模型，研究了地区政务服务水平对中国FDI区域分布数量和质量的影響。研究发现，一个城市的政务服务水平越高，越能吸引更多、更高质量的

* 王碧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助理研究员，wangbijun@cass.org.cn；wangbijuncass@126.com。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并自负负责。

① 冀相豹（2014）：“地区政务服务水平对我国FDI区域分布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第4期。

FDI, 并且中西部地区的政务服务水平对 FDI 起到了更加积极的作用。

在两党制或多党制国家, 不同的党派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 往往拥有不同的政策取向。因此, 党派政治以及政党的政策倾向在一国对外经济政策变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韩剑、徐秀军 (2014)^① 从党派政治的角度研究吸引外资政策中的政治因素, 提出党派政治影响外资区位选择的假说。作者采用 2009—2012 年中国对美国各州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 美国各州党派政治倾向对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 并且对绿地投资影响比跨国并购更加显著。给定其他因素前提下, 中国企业会优先选择在民主党支持率较高的州进行投资。这背后的内在机理是, 从静态分配效应看, 外资流入引起东道国对劳动需求增加, 导致工资水平提高和资本收益下降。该分配效应使劳动力充裕的所有者鼓励外资流入, 而资本充裕的所有者倾向于实施限制外资的政策。从动态角度看, 由于外资投入的资产专用性, 外国投资者希望将投入与东道国利益捆绑, 减少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 于是劳动者联盟与外国投资者构成一种互补而非相互竞争的关系, 其结果是劳动者联盟会比资本所有者联盟更欢迎外资流入。

制度对于国际投资的影响具有不同维度。王永钦、杜巨澜、王凯 (2014)^② 考察了东道国的不同制度维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ODI) 区位选择的影响。作者以中国 2002—2011 年间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 842 笔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样本, 研究了东道国的话语权与问责制、政治稳定与杜绝暴力/恐怖主义、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治水平、腐败控制这六类制度性因素对中国 ODI 区位选择的影响, 并且讨论了税收 (避税) 因素和自然资源因素的作用, 以及它们与制度因素的交互作用。研究发现, 与大部分跨国公司不同, 中国的 ODI 不太关心对方国家的政治制度 (话语权与问责制) 和政治稳定度, 而更关心政府效率、监管质量和腐败控制, 并倾向于避开法律体系严格的国家。研究还发现, 东道国的制度质量与避税功能之间存在替代关系。

除了制度的绝对水平外, 制度距离是另一考量因素。考虑到企业在母国特定制度氛围和腐败环境下处理腐败事务的经历和技能能否适应东道国新的制度氛围和腐败环境, 胡兵、邓富华 (2014)^③ 分析了中国与东道国腐败程度的差异 (腐败距离) 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作者采用 Heckman 两阶段选择模型以及 2003—2011 年中国对 168 个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 实证研究发现, 腐败距离对中国是否进入东道国开展直接投资并无显著影响, 但对进入东道国后的直接投资规模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也就是说, 中国企业具有较强的风险偏好, 敢于承受风险进入腐败水平与母国差异较大的东道国, 这与传统发达国家的跨国投资理论和事实存在一定出入, 但反映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中国投资故事。周经、张利敏 (2014)^④ 则区分了正式制度距离 (在包括法律、规则、制裁等强制约束人们行为方面上存在差异)、非正式制度距离 (主要包括道德观念、文化认同感和社会普遍认可的传统习俗等) 和强制制

① 韩剑、徐秀军 (2014): “美国党派政治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 8 期。

② 王永钦、杜巨澜、王凯 (201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 制度、税负和资源禀赋”, 《经济研究》, 第 12 期。

③ 胡兵、邓富华 (2014): “腐败距离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观和行为学的整合视角”, 《财贸经济》, 第 4 期。

④ 周经、张利敏 (2014): “制度距离、强效制度环境与中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 《国际贸易问题》, 第 11 期。

度环境（即东道国具备促进市场经济运行的强有力的制度环境，没有对外国企业的所有权份额、投资领域、控股方式、企业责任等施加苛刻限制）对中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作者发现，正式制度距离越远，中国跨国企业海外投资选择合资方式的概率越大。

冀相豹（2014）^①同样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具有制度相似性特征，即中国企业倾向于到制度差异较大的国家进行投资。但作者发现，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 ODI 具有差异性影响，发达国家的制度因素对中国 ODI 具有正向影响，即中国 ODI 倾向于制度因素质量好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具有反向影响，即中国 ODI 倾向于制度因素质量差的发展中国家。作为特殊性制度保护机制的 BIT 对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 ODI 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对一般性制度因素具有显著替补作用，在发达国家 BIT 则不存在上述效应。

制度对于国际投资影响的研究还深入到不同投资动机的层面。岳咬兴、范涛（2014）^②基于 2003—2011 中国对亚洲 26 个主要国家及地区的直接投资数据，考察了制度环境对中国市场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效率寻求型、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研究发现，虽然中国 ODI 总体偏向于与自身制度环境差距较大且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或地区，但对于市场寻求型和效率寻求（主要是融资便利寻求型）ODI，中国企业更加倾向于投资与本国制度环境相接近的国家或地区，尤其是一些制度环境相对中国差的并且正在走向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此外，中国在亚洲的资源寻求型 ODI 与制度环境的关系并不显著，这缘于中国在亚洲建立的良好国际关系以及资源丰富的国家开放性政策。

以上研究制度因素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都是从东道国的制度因素考虑，还有部分研究则是从母国制度因素切入。余官胜、袁东阳（2014）^③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金融发展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金融发展包含量和质两个维度的内容，量维度指的是金融资源总量的增加，质维度指的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研究发现，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量维度金融发展会阻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只有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量维度金融发展才构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助推器。与之相反，质维度的金融发展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能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质维度金融发展则构成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绊脚石。

（二）企业异质性

根据经典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生产率是决定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具体而言，生产率低的企业只能选择在国内市场销售甚至是被市场淘汰，生产率相对较高的企业既可以在国内市场销售也能够进行出口，而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则可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有部分文献试图探索经典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能否解释中国企业“走出去”行为。严兵、张禹、韩剑（2014）^④利用江苏省制造业企业 2005—2007 年生产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

① 冀相豹（201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制度的视角”，《国际贸易问题》，第 9 期。

② 岳咬兴、范涛（2014）：“制度环境与中国对亚洲直接投资区位分布”，《财贸经济》，第 6 期。

③ 余官胜、袁东阳（2014）：“金融发展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助推器还是绊脚石——基于量和质维度的实证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第 8 期。

④ 严兵、张禹、韩剑（2014）：“企业异质性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江苏省企业的检验”，《南开经济研究》，第 4 期。

层面数据,验证了全要素生产率高的企业更可能对外投资这一传统理论。此外作者还发现,与资本密集度较低的企业相比,在资本密度较高的企业样本中,生产率对其对外投资决策的影响更大。不论是出口企业还是非出口企业,企业生产率均对企业的对外投资决策产生了显著影响,在相同生产率水平下,出口企业更倾向于对外直接投资,生产率并未对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决策产生显著影响。企业生产率不仅仅影响企业是否对外投资的决策,而且对投资金额也有显著正面影响。

以上的文章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分析,现有文献鲜有涉及服务业领域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戴翔(2014)^①弥补了这一缺陷,利用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从生产率视角对企业“走出去”投资于制造业和服务业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生产率对企业“走出去”投资于制造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符合经典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预期。但对“走出去”投资于服务业并不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呈现企业“走出去”的“生产率悖论”现象。

但陈景华(2014)^②却发现,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并不存在“生产率悖论”。作者利用中国服务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以及全球最大的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截面数据,实证分析了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检验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在服务业领域的适用性。结果显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适用于对服务企业的研究。服务业跨国公司存在与制造业跨国公司相同的特征,企业规模越大,跨国经验越丰富,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也越大。

(三) 其他

空间依存(spatial interdependence)和国际直接投资。空间依存指的是相近的国家和地区之间能互相影响,产生关联。Nwaogu & Ryan(2014)^③实证分析了美国对非洲、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直接投资是否受空间依存的影响。作者通过空间自回归模型(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 SAR)在控制了空间固定效应后,发现美国对非洲、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直接投资受到对其临近地区东道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影响的途径主要是垂直专业化,即从子公司出口中间产品到第三国市场进行加工,然后再运输到最终目的地。

除了相近国家或地区国际直接投资互相影响外,同一个国家以往在某地区的投资也会影响该国之后投资者的行为,即同源国企业具有集聚效应。颜银根(2014)^④根据2000—2010年期间20个国家(地区)在中国19个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分析了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研究发现,多数国家FDI在中国选择区位时考虑同源国企业集聚效应,即本国以往在该地区的投资。此外,研究还发现,不同来源国FDI区位选择因素存在较大差异,但工资水平仍然是多数国家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中国选择区位时所考虑的因素。

① 戴翔(2014):“生产率与中国企业‘走出去’:服务业和制造业有何不同?”,《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6期。

② 陈景华(2014):“企业异质性、全要素生产率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服务业行业和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国际贸易问题》,第7期。

③ Nwaogu, U. & Ryan, M. (2014). Spatial Interdependence in US Outward FDI into Africa,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The World Economy*, 37 (9), 1267 - 89.

④ 颜银根(2014):“FDI区位选择:市场潜能、地理集聚与同源国效应”,《财贸经济》,第9期。

庞明川、韩国高、刘婧（2014）^①和谷本正幸、王雅琦（编译）（2014）^②分析了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直接投资下降的原因。庞明川、韩国高、刘婧（2014）基于1986—2012年主要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汇率升值对美国对华投资具有显著影响，对日本与欧盟的对华投资影响不显著。中国外资政策的调整、政策红利的衰减对美国与日本的对华投资没有影响，但对欧盟对华投资影响显著。投资国对外投资政策的变化对美国企业的对华投资具有显著影响，但对欧盟对华投资没有影响。谷本正幸、王雅琦（编译）（2014）则聚焦日本，自1989年日本国际协力银行每年对日本制造业企业海外经营进行调查以来，中国第一次失去首选目的地的位置。在日本企业的担心因素中，“劳动力成本上升”是最大的忧虑（占比为77.1%），“市场竞争激烈”（占比为62.0%）排名其次，而“执法不严”（55.3%）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46.4%）两项原因分随其后。自2012年秋季日本政府的钓鱼岛国有化事件引发中国国民抵制日货后，“社会不稳定”这一因素的投票比例在2013年的调查中迅速上升到了31.8%（先前一直稳定在10%左右）。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不仅增加了日本企业对外投资的疑虑，而且陈景华（2014）^③通过全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平均工资的上涨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推动因素。

二、国际投资对母国的影响

国际投资对母国的影响指的是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来源国的影响。这一影响在2014年的国内外学术研究中主要关注的是对国内出口和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此外，部分文献还研究了对母国国际收支、就业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一）出口

目前有关对外直接投资（ODI）与国际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然存在较大分歧。在理论研究中，ODI与出口贸易既存在替代关系也存在互补关系，但在实证研究中互补性关系的结论得到更广泛的验证。陈俊聪、黄繁华（2014）^④利用2003—2011年中国对40个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通过引力模型对海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商品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ODI显著地促进了中国零部件、机械设备等中间产品的出口增长，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种出口带动作用都比较明显。其中，对发达国家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出口升级效应；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促进了出口规模扩张，但对贸易结构升级效应相对较弱。

既有针对中国的研究文献，包括陈俊聪、黄繁华（2014），基本上采用宏观层面的加总数据，这不可避免地掩盖了企业间的异质性以及产生样本估计偏差问题，同时，宏观数据很

① 庞明川、韩国高、刘婧（2014）：“入世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直接投资下降影响因素分析”，《财贸经济》，第5期。

② 谷本正幸、王雅琦（编译）（2014）：“中国不再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首选地”，《国际经济评论》，第2期。

③ 陈景华（2014）：“中国OFDI来源的区域差异分解与影响因素——基于2003—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7期。

④ 陈俊聪、黄繁华（2014）：“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结构优化”，《国际贸易问题》，第3期。

难避免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毛其淋、许家云(2014)^①运用高度细化的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从微观层面系统地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出口的微观影响,进而挖掘了大量宏观层面研究无法呈现的结论。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出口创造效应。具体而言,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显著地提高了企业出口占销售的比例,而且还提高了企业出口的概率。此外,毛其淋、许家云(2014)还通过引入生存分析模型的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显著降低了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的风险,延长了企业出口持续期。

传统理论预期水平型直接投资替代了出口,而垂直型直接投资促进了出口。蒋冠宏、蒋殿春(2014)^②认为用传统水平或垂直型直接投资来界定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恰当。作者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出发,梳理了商贸服务类投资、当地生产类投资、技术研发类投资和资源开发型投资这四种类型海外直接投资影响企业出口的机制。在以上理论机制的基础上,作者利用倍差法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促进了企业出口,并且与其他投资动机相比,商贸服务类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与其他东道国相比,投资高收入国家的“出口效应”最为明显。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先上升后下降,呈现倒“U”形。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增加了出口的深度边际,也扩展了出口的广度。

以上文章针对的是中国经验进行的分析,张海波(2014)^③则是利用世界71个国家1995—2011年的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系统GMM方法实证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ODI)对母国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的影响。从理论上说,ODI对母国出口贸易品的技术含量可能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渠道产生影响,直接渠道是母国通过ODI在国外投资建厂或并购东道国企业,可以带动不同类型的贸易品出口,从而直接影响母国出口贸易品的结构和技术含量;间接渠道是企业通过ODI可以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而对母国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产生影响。作者的实证检验则发现,ODI能够提升母国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但进一步分析发现ODI仅对发达国家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对发展中国家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抑制效应。

(二) 生产率

研究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企业是否具有生产率提高的效应,选择适当的对照组企业非常关键。因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自选则”问题,即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投资之前就比非对外投资企业的生产率高,所以需要区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生产率提升是由于投资前的“自选择效应”还是投资后的“生产率效应”导致的。蒋冠宏、蒋殿春(2014)^④采用数据匹配方法选择与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最有可比性的企业作为对照组,并利用倍差法(DID)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研究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

① 毛其淋、许家云(201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抑或抑制了企业出口?”,《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9期。

② 蒋冠宏、蒋殿春(2014):“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经济研究》,第5期。

③ 张海波(2014):“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的影响——基于跨国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第2期。

④ 蒋冠宏、蒋殿春(2014):“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生产率进步”,《世界经济》,第9期。

企业生产率，但提升作用随着时间推移逐渐降低，企业的技术研发型外向投资不一定显著提升企业生产率，但东道国发展水平的差异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有较大影响。

肖慧敏、刘辉煌（2014）^①采用2005—2011年企业微观数据，基于倾向分值匹配方法估计境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生产及技术效率的影响。作者同样发现，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技术效率，并且投资于发达国家的企业比仅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获得了更多的效率改进。此外，作者还考虑了企业性质的差异，发现民营对外投资企业拥有更强的学习能力。但作者对外投资的积极作用甚至存在于企业跨国投资之前的这一发现，可能涉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自选则”问题。因此，肖慧敏、刘辉煌（2014）未能有效区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生产率提升是由于投资前的“自选择效应”还是投资后的“生产率效应”导致的。

董有德、孟醒（2014）^②和王恕立、向姣姣（2014）^③都是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同类型和投资动机入手，分析ODI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区域差异。董有德、孟醒（2014）依照各境外企业（机构）的经营范围划分为：研发机构、制造机构、营运机构、贸易机构、非经营机构和原料获取机构。王恕立、向姣姣（2014）则是将ODI划分为技术寻求、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三类投资动机。董有德、孟醒（2014）结果显示，中国企业在海外设立的研发、制造和营运机构是ODI逆向技术溢出的主要渠道，而非经营性机构和原料获取机构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作者还发现，这种溢出效应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主要依靠研发机构的溢出，中西部地区主要依靠制造和营运机构的溢出，而在西部地区，贸易机构也是逆向技术溢出的一个重要来源。王恕立、向姣姣（2014）则发现，积极的O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主要来源于对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寻求型ODI，这种效应在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但中部地区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要比东、西部明显；来源于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的ODI逆向技术溢出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呈负向效应。

毛其淋、许家云（2014）^④同样发现，多样化型ODI和研发加工型ODI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贸易销售型ODI，而非经营型ODI基本上不对企业创新活动产生影响。但作者除了从企业经营范围角度考察了ODI对企业创新的即期影响，还考察了ODI对企业创新的动态影响和对企业创新持续期的影响。研究发现，ODI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具有持续性，并且其影响程度逐年递增。此外，作者还发现，ODI在总体上显著地延长了企业创新的持续期。但不同类型ODI对企业创新持续期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其中向高收入国家进行ODI比向低收入国家进行ODI、多分支机构ODI比单分支机构ODI更有助于延长企业创新的持续期。多样化型ODI对企业创新持续期的延长作用最大，研发加工型ODI次之，而贸易销售型ODI相对较小。

（三）其他

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学术界有关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收支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直接

① 肖慧敏、刘辉煌（201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了企业效率吗？”，《财贸经济》，第5期。

② 董有德、孟醒（2014）：“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国内企业创新能力——基于我国分价值链数据的检验”，《国际贸易问题》，第9期。

③ 王恕立、向姣姣（2014）：“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不同投资动机的经验分析”，《国际贸易问题》，第9期。

④ 毛其淋、许家云（2014）：“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世界经济》，第8期。

投资对东道国国际收支的影响上,鲜见对投资母国国际收支影响的研究。付海燕(2014)^①借鉴国内外关于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国际收支影响的研究成果,提出了ODI对母国国际收支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该框架下对中国ODI的国际收支影响进行了实际测算。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投资效应、利润汇回效应和贸易效应所包含的7种渠道影响母国国际收支。对外直接投资初期会造成母国国际收支净效应为负的情形,但伴随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累积,国际收支净效应会逐步为正。付海燕(2014)还测算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国际收支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大于国内投资收益率。虽然近年来国际收支净效应持续为负,但对改善“双顺差”模式起到了积极作用。

对职工收入的影响。毛其淋、许家云(2014)^②利用中国2004—2008年的微观企业数据,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模型(PSM-DID)系统地评估了ODI对企业职工收入的微观影响。结果表明,企业ODI显著地提高了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并且ODI也显著地拉大了企业内工资差距。这意味着与非技能工人相比,技能工人的工资水平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后实现了更大幅度的增长。

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现有文献一般基于两个相互独立的视角研究国际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一是从东道国的角度出发,探讨一国FDI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宏观上,FDI通过影响东道国的市场结构、供需结构、出口结构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微观上,FDI通过关联效应、技术外溢效应、竞争效应影响东道国产业升级。二是从投资国的角度出发,探讨一国ODI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相关的理论包括“产业生命周期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LLL分析框架”等。贾妮莎、韩永辉、邹建华(2014)^③将FDI和ODI两者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研究。作者利用1982—2012年中国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协整、误差修正和脉冲响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双向FDI与产业升级的关系。研究发现,在短期,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更为突出;在长期,中国双向FDI对产业结构升级均有促进作用,但FDI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效应更显著,ODI则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王建平(2014)^④聚焦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影响。作者选取2002—2012年中国文化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和文化产业增加值进行VAR模型回归分析。结果发现,中国文化产业海外直接投资对文化产业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虽然当期效果不太明显,滞后效应却较为显著。

三、国际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

国际投资对东道国(也就是投资接受国)的影响,历来是国际投资国内外学术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在2014年的文献中,学者在经济、制度和环境三个层面,就业、投资、增长、资本流动、生产率、制度和环境七个角度展开。

① 付海燕(2014):“OFDI对中国国际收支影响的机理与实际测算”,《统计研究》,第12期。

② 毛其淋、许家云(2014):“中国外向型FDI对企业职工工资报酬的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经验分析”,《国际贸易问题》,第11期。

③ 贾妮莎、韩永辉、邹建华(2014):“中国双向FDI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国际贸易问题》,第11期。

④ 王建平(2014):“‘走出去’战略对我国文化产业影响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第12期。

（一）环境

一直以来，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环境的影响有“污染天堂”假说和“污染晕轮效应”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污染天堂”假说指的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发展中国家往往会放松环境管制标准、加速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并生产更多的污染密集型产品，从而沦为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污染晕轮效应”则是说 FDI 不但没有恶化东道国的环境质量，反而有利于改善区域环境污染。

这巨大的差异主要源于环境系统的复杂性、研究方法、样本与变量选取的不同，对应于变量的不同发展阶段，FDI 的环境效应存在较大差异。卢进勇、杨杰、邵海燕（2014）^① 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与环境污染排放的关系。作者发现，当选取工业废水为被解释变量时，FDI 倾向于恶化城市环境；当以工业二氧化硫为被解释变量时，在 FDI 引进的初级阶段，破坏当地城市环境，但随着引资结构调整与引资质量的提升，FDI 更多表现出对污染排放的制约性。

由于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压力，发展中国家也加大了环境规制强度，试图改变长期以来用环境换增长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于是，环境规制强度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卢进勇、杨杰、邵海燕（2014）发现，人口密度与环境规制是污染减排的双刃剑。人口密集易于导致污染的加剧，同时迫于各种压力，人口密集的城市对环境的管制通常严于其他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又降低了环境污染。刘朝、韩先锋、宋文飞（2014）^② 则使用 1999—2011 年中国工业的行业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从工业总体和行业分组两个层面分别考察了环境规制强度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长期和短期互动机制。作者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会导致环境污染程度的正向变动，引起环境规制强度增大，而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大却会降低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但是环境规制强度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互动机制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在污染程度较高、R & D 强度较低的产业，环境规制强度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短期影响效应更为明显。而在技术密度较高、规模较小、垄断程度较低的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规制强度的短期影响效应更加显著。

由于环境是公共产品，与政府的行为选择密切相关。许和连、邓玉萍（2014）^③ 利用 1997—2010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地方政府间的策略性引资竞争对地区资源环境绩效的影响。作者发现，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而展开的财政支出竞争对资源环境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即，当财政支出低于该门槛值时，FDI 的引入将会降低资源环境绩效水平；而当财政支出超过该门槛值时，外资企业更容易通过清洁技术溢出来改善地区资源环境绩效。

① 卢进勇、杨杰、邵海燕（2014）：“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与中国环境污染——基于 249 个城市数据的分位数回归分析”，《国际贸易问题》，第 4 期。

② 刘朝、韩先锋、宋文飞（2014）：“环境规制强度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互动机制”，《统计研究》，第 5 期。

③ 许和连、邓玉萍（2014）：“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源环境绩效的实证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 1 期。

（二）就业

依据跨国公司理论，外资企业往往规模更大，资本和技术更加密集，工资报酬也相对更高。叶生洪、盛月、孙一平（2014）^①在国内首次从外资并购的新视角研究外资所有权的工资收入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外资所有权的内生性问题。作者基于稳健的倍差估计和分位数回归分析发现，在剔除个体固定效应之后仍然存在外资进入的工资溢价，但是这种溢价具有一定时滞，自外资并购之后的第2期出现，第3期增大。作者还发现，外资并购对企业人均工资的条件分布存在显著的影响差异。外资并购进一步提高了在被并购之前就实行高工资政策企业和资本密集企业的平均工资收入，低工资企业和劳动密集企业的人均工资水平在短期内不受外资并购的影响。

国际投资对于东道国整体就业方面的研究结论并未达成一致。学者的研究从早前单方面肯定FDI对就业的正向促进作用，到近年来时期论、条件论、抵消论和结构论等更为理性和深入的研究。赵德昭（2014a）^②认为研究结论的不一致性隐含着FDI与东道国就业，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之间可能存在着非线性关系。作者利用以门槛回归技术为代表的非线性计量经济学理论，运用中国1998—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FDI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门槛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FDI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显著存在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和城乡实际收入差距的“双门槛效应”。随着门槛值的不断增加，FDI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正向影响效应均呈现逐渐递减的趋势。

赵德昭（2014b）^③进一步将外商直接投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从空间效应角度进行研究。作者研究发现，各省份FDI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FDI是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空间集聚呈现“结块效应”特征的主要原因。FDI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形成了“扩散中心”并处于高水平均衡状态，但其在西部边疆地区形成了低值集聚区域并陷入了“低端锁定”。FDI区位分布的非均衡性是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集聚呈现“两极分化”特征的主要经济诱因。此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还受到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城乡收入差距、非农产业发展和城镇失业率等空间影响因素差异的冲击。

中国的跨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的投资并不具备传统西方跨国企业在技术、品牌、管理等方面的所有权优势。因此，发达国家对于来自中国的投资是期望与担忧并存的。尤其是在欧洲，存在着对中国投资可能引起的失业问题的忧虑。一方面，部分民众担心中国企业并购欧洲企业后，进行重组裁员，甚至仅仅为了获得技术等战略性资产而完全关闭企业将生产线转移回中国国内。另一方面，还有部分欧洲企业尤其是南欧的企业和民众由于自身的竞争力不强，担心中国企业进入后带来的竞争，引起失业。陈涛涛、柳士昌、顾凌骏（2014）^④分析了中国在欧洲投资的体量，认为由于当前中国投资所占份额非常少，远不足以对欧洲构成实质性

① 叶生洪、盛月、孙一平（2014）：“外资并购对提高工人工资的影响研究——基于制造业企业的分析”，《国际贸易问题》，第12期。

② 赵德昭（2014a）：“FDI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门槛效应吗”，《财贸经济》，第11期。

③ 赵德昭（2014b）：“FDI、第三方效应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空间集聚——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检验”，《南开经济研究》，第6期。

④ 陈涛涛、柳士昌、顾凌骏（2014）：“赢得机遇的关键在于应对国际环境的挑战——基于投资欧洲的实践”，《国际经济评论》，第1期。



影响。但由于欧洲失业是当前欧洲环境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中国企业应当调整投资欧洲的策略，谨慎甚至放弃“转移价值链”的投资策略，进而采用“延展价值链”的投资策略，从而包容欧洲失业所造成的对外来资本的诉求。

（三）增长和制度

现有文献在研究中国经济活动对非洲的影响时，往往只选择贸易、直接投资或援助其中一种渠道。汪文卿、赵忠秀（2014）^①则同时从贸易、直接投资和援助三个方面，使用索洛增长模型及1991—2011年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在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经济活动对该地区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作者发现，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不但促进了非洲经济的增长，而且促进作用要大于世界其他国家对非洲的直接投资。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也对非洲的经济增长有正向的影响，但中非贸易对非洲的经济有正向的影响，也有负向的影响。

国际投资对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还具有区域性和溢出性。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问题进行研究在国外学术界成为新的热点，弥补了传统计量方法的缺陷。但文献大多采用时间序列或是截面数据，运用空间面板模型进行实证的文献还不多。且这些文献主要探讨的是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针对某一特定区域的研究还很少。陈海波、张悦（2014）^②在增长理论和空间经济学框架下，选取2004—2012年江苏13个市的统计数据，运用Matlab软件建立空间面板模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结果发现，江苏本地的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会对本地的经济产生促进作用，即直接效应；也会带动邻近地域的经济发展，即间接效应。

除了经济增长数量之外，经济增长质量得到更多关注。随洪光、刘廷华（2014）^③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亚太、非洲和拉美地区主要发展中引资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分别采用静态模型和系统GMM方法检验FDI对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并考察政府因素在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FDI显著提升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其贡献主要在于对增长效率和可持续性方面的作用，同时政府对有效利用外资具有积极作用，但作用系数较小。分区域来看，亚太地区外资作用最为显著，拉美地区政府干预效果最好，但政府作用随市场化进程逐渐降低，市场化进程与政府干预效果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Mijiyawa（2014）^④则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中东道国产权体制改革的影响。作者使用1970—2005年间80个发展中东道国的面板数据，在控制了内生性后，研究发现，在执政者具有一定初始水平的约束下，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对于东道国产权制度改革概率的影响显著为正。在样本80个发展中东道国里，只有20个达到了执政者具有一定初始水平约束的要求，其中5个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① 汪文卿、赵忠秀（2014）：“中非合作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贸易、直接投资与援助作用的实证分析”，《国际贸易问题》，第12期。

② 陈海波、张悦（2014）：“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区域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空间面板模型”，《国际贸易问题》，第7期。

③ 随洪光、刘廷华（2014）：“FDI是否提升了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来自亚太、非洲和拉美地区的经验证据”，《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1期。

④ Mijiyawa, A. (2014). Reforming Property Rights Institu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n FDI Inflows Help? *The World Economy*, 37 (3), 410-33.

（四）投资和资本流动

国际投资对于东道国国内投资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一方面，FDI 可能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经验，提高国内资本的利用效率，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入”影响。但另一方面，FDI 对国内资本构成激烈竞争，会使得原本属于国内资本的投资机会被争夺，从而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出”影响。现有文献基本没有讨论金融发展对于 FDI 挤入挤出效应的影响。谭之博、赵岳（2014）^① 弥补了这一缺陷，运用 56 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使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对金融发展对于 FDI 挤入挤出作用的影响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FDI 对于国内投资的挤出作用越显著；当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很低时，FDI 对国内投资的作用才表现为挤入。

国际投资对于东道国国内投资的影响还体现在区域资本流动方面。王喜、赵增耀（2014）^② 利用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95—2011 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 FDI 对中国区域资本流动的实际影响。研究结果发现，FDI 对中国区域资本流动产生了抑制作用，这种作用通过两个效应实现。一是资本供给拥挤效应，即 FDI 降低了各地对本地区和国内其他地区的资本需求，进而促进了区域内资本流出，限制了区域外资本流入。二是市场规模扩大效应，即 FDI 通过扩大市场规模总量来影响区域资本流动。作者还发现，这种抑制作用存在区域差异性，中部地区负面影响最严重，西部次之，东部最低。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非税负担，有利于促进区域资本流入。

郭进、徐盈之、王书斌（2014）^③ 则通过建立制造业区际转移动态面板模型，依此对 FDI 区位变迁与中国制造业区际转移的相关关系、作用效果、地区差异性和行业差异性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FDI 区位变迁和中国制造业区际转移均呈现出“东出西进”和“就近转移”两种趋势。FDI 区位变迁是影响中国制造业区际转移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对中国东部地区的制造业规模具有扩散作用，对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规模具有集聚作用，并且在中部地区的集聚作用更强。从行业层面来看，作者发现 FDI 区位变迁对于促进大部分制造业行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食品饮料加工制造业和造纸及纸制品业向东中部地区转移、医药制造业向东部地区转移具有显著影响。

除了对国内投资的影响外，部分文献着手研究来自不同国家国际投资之间是否存在挤出效应。这一研究的背景是，随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西方部分企业认为中国企业受到了来自政府的看似无限制的低利率贷款和软预算约束的支持，进而担心自己被挤出国际市场。姚树洁、冯根福、王攀、欧境华（2014）^④ 构建了一个拓展的引力模型，运用 2003—2009 年间 33 个 OECD 成员国对 155 个国家投资的面板数据，通过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挤占了 OECD 成员国的对外投资。研究发现，中

① 谭之博、赵岳（2014）：“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金融发展的影响”，《金融研究》，第 9 期。

② 王喜、赵增耀（2014）：“FDI 与区域资本流动：抑制还是促进”，《国际贸易问题》，第 4 期。

③ 郭进、徐盈之、王书斌（2014）：“FDI 区位变迁与制造业区际转移——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国际贸易问题》，第 10 期。

④ 姚树洁、冯根福、王攀、欧境华（2014）：“中国是否挤占了 OECD 成员国的对外投资？”，《经济研究》，第 11 期。



国的对外投资在总体上挤占了 OECD 成员国的对外投资；但是在资源丰富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中国的对外投资并未对 OECD 成员国的对外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五）生产率与技术溢出

外商直接投资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重要渠道。众多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能通过技术溢出的渠道为创新活动带来益处，但也有一些研究发现外资对内资部门没有显著的生产率外溢，甚至产生了负向的竞争作用。叶娇、王佳林（2014）^① 从省级层面继续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作者利用吸引外资规模最大的省份江苏省 2002—2011 年地区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 FDI 的流入对江苏省技术创新水平有着显著地促进作用。作者还发现，虽然江苏省的 FDI 技术溢出效应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仍落后于东部地区水平。李晓钟、王倩倩（2014）^② 则分析了 1998—2011 年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电子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者发现，随着电子产业利用外资规模持续扩大，不仅通过技术、资本一揽子要素引进，直接推动了电子产业产能扩大和技术进步；而且还通过外资的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人员培训和产业关联等对内资企业产生技术外溢，推动内资企业技术水平提升。但是，尽管外资对电子产业的直接效应高于高新技术产业平均水平，但其技术溢出效应却低于平均水平。

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政府普遍采取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可能以扭曲市场和资源要素价格为代价。李平、季永宝（2014）^③ 选取 1998—2012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 OLS、2SLS 以及 GMM 等方法实证检验了要素价格扭曲在不同阶段对 FDI 技术溢出效应的不同影响。结果发现，FDI 技术溢出效应在要素市场扭曲的不同阶段呈现差异化特征。起初阶段，地方政府扭曲要素市场换取的 FDI 激励政策降低了外资进入的门槛，在吸引更多外资的同时却牺牲了外资质量，进而弱化、抑制了 FDI 技术溢出效应。随着政府政策导向的变化，要素市场扭曲度明显降低，市场机制作用得以充分发挥；FDI 技术溢出效应逐渐显现。

东道国能否从外商直接投资中获取先进技术与当地的吸收能力密切相关。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认为东道国的技术越落后即国内外技术差距越大，东道国技术进步的潜力越大，因而技术溢出效应越显著。另一种则认为东道国的吸收能力至少需要达到一个最低门槛水平才能吸收和应用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FDI 才会对东道国产生技术溢出。Baltabaev（2014）^④ 在第一种观点领域推进了研究。作者认为之前关于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溢出效应的不同结果主要是由于缺乏一致性估计。为了控制内生性，作者通过构建一个全新的 FDI 外部工具变量，使用系统 GMM 方法进行估计。作者研究发现，FDI 显著促进了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且与技术领先者的距离越远，这一促进作用越大。

更多的研究则是在第二种观点，即门槛水平和吸收能力领域进行了深入拓展。何兴强、

① 叶娇、王佳林（2014）：“FDI 对本土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江苏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国际贸易问题》，第 1 期。

② 李晓钟、王倩倩（2014）：“研发投入、外商投资对我国电子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影响比较——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与分析”，《国际贸易问题》，第 1 期。

③ 李平、季永宝（2014）：“政策导向转化、要素市场扭曲与 FDI 技术溢出”，《南开经济研究》，第 6 期。

④ Baltabaev, B. (2014).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New Macro-evidence. *The World Economy*, 37 (2), 311–34.

欧燕、史卫、刘阳 (2014)^① 分析了 FDI 技术溢出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外贸依存度、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水平 4 个吸收能力因素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 FDI 技术溢出在上述 4 个因素都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基础设施越完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 FDI 的技术溢出越显著。适度的外贸依存度有助于促进 FDI 的技术溢出, 外贸依存度过低或过高时, FDI 都不存在显著的技术溢出。叶娇、王佳林 (2014) 同样发现, 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人力资本显著地促进了 FDI 对当地的技术溢出效应。

研发投入是影响吸收能力的重要因素。罗军 (2014)^② 利用中国 2002—2012 年省际面板数据, 基于门槛回归模型分别考察了 FDI 影响中国创新能力的研发资金投入门槛效应和研发劳动投入门槛效应。作者发现, FDI 对中国创新能力的影响有明显的研发资金投入双门槛效应和研发劳动投入门槛效应: 在低研发资金投入和低研发劳动投入省份, FDI 对创新能力有负向影响; 在中等研发资金投入和中等研发劳动投入省份, FDI 对创新能力有较小的正向影响; 在高研发资金投入和高研发劳动投入省份, FDI 会显著促进创新能力的提高。作者还发现, 中国中等研发资金 (劳动) 投入和高研发资金 (劳动) 投入的省份在不断增加, 低研发资金 (劳动) 投入的省份在减少, 但没有跨越最低研发资金 (劳动) 投入门槛的省份所占比例还相当大。

经济转型是吸收能力的另一个重要可能影响因素。陈丰龙、徐康宁 (2014)^③ 利用 23 个转型国家 1999—2010 年的跨国面板数据考察了经济转型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 在控制了经济转型与 FDI 的交互作用后, 经济转型并没有显著地促进 FDI 的技术溢出。然而, 分样本估计后, 作者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转型国家, 没有证据表明经济转型促进了 FDI 技术溢出; 但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转型国家, 经济转型却显著地加快了 FDI 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作者认为, 转型国家间 FDI 技术溢出呈现出的差异性, 与各国的转型方式不同有关。其中, 大规模私有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FDI 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

除了宏观层面因素外, 吸收能力差异的另一个维度来自企业异质性。覃毅 (2014)^④ 分析了企业异质性, 尤其是所有制结构的不同如何带来技术溢出差异。作者采用中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数据, 分别采用 LP 法和 SFA 法测算了中国加入 WTO 以后, 国有、集体、法人和个人 4 类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及其变化, 基于投入产出表所揭示的产业关联, 计算了 FDI 在工业部门各行业中的渗透程度, 并利用企业效率和外资渗透度之间的相关性检验了制造业部门中的 FDI 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技术外溢。研究发现, 产权结构异质性的确影响了中国国内企业对 FDI 技术外溢的吸收。具体表现为, FDI 对民营供应企业的后向溢出效应非常明显, 但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下游采购企业, 主要是其中的非公有制企业的生产率增长。国有企业对 FDI 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非常有限, 基本不显著。然而, 叶娇、王佳林 (2014) 却发现, 地区企业类型尚未对 FDI 的技术溢出效应产生正面影响。该研究采用国有

① 何兴强、欧燕、史卫、刘阳 (2014): “FDI 技术溢出与中国吸收能力门槛研究”, 《世界经济》, 第 10 期。

② 罗军 (2014): “研发投入门槛、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创新能力——基于门槛效应的检验”, 《国际贸易问题》, 第 8 期。

③ 陈丰龙、徐康宁 (2014): “经济转型是否促进 FDI 技术溢出: 来自 23 个国家的证据”, 《世界经济》, 第 3 期。

④ 覃毅 (2014): “企业异质性、所有制结构与 FDI 技术外溢——来自微观层面的证据”, 《财贸经济》, 第 3 期。

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当地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城市的企业类型。

以上关于 FDI 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整体 FDI 或者是制造业 FDI。随着全球经济日趋服务化,服务业已经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服务业 FDI 能否像制造业 FDI 一样带来国外的 R & D 溢出?黄繁华、王晶晶(2014)^①运用 41 个国家 2005—2011 年的面板数据,将服务业 FDI 从整体中剥离,利用 LP 模型测算东道国服务业 FDI 的 R & D 溢出效应,并考察了服务业 FDI 研发外溢对生产率变动影响的机制。研究发现,服务业 FDI 的 R & D 溢出会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地促进作用,并且主要体现在对技术效率的改善上。作者进一步从人力资本、制度因素以及金融发展水平这三个方面考察了东道国不同维度的吸收能力对服务业 FDI 的 R & D 溢出效应的影响,发现人力资本以及制度因素能够显著促进服务业 FDI 的 R & D 溢出,但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却阻碍了东道国这一途径的技术吸收。

国际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除了与东道国的特征有关外,还受到母国特征的影响。孙早、宋炜、孙亚政(2014)^②摒弃了“从溢出渠道研究东道国受益情况”的传统思路,同时,强调了跨国企业的母国特征对企业投资动机进而对东道国溢出效应的决定。作者利用中国 1995—2011 年按两位码分类的中国工业行业分布滞后动态面板数据估计了不同来源地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该文研究发现,美国主要涉及高技术产业,对溢出效应的控制也最为严格,对中国资本密集型工业的贡献在当期显著,滞后期则明显减弱。欧盟以追求高市场化程度为战略目标,与中国工业绩效改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东南亚跨国企业侧重于利用文化趋同性来降低劳动生产要素的成本,来自这一地区的 FDI 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工业的贡献明显强于资本密集型工业。

母国特征除了可以按照来源地划分外,还可以根据技术密度区分。马述忠、吴国杰、任婉婉(2014)^③检验了不同技术密度的海外研发投资与中国不同类型研发投资的互补性,并研究了其对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海外研发投资直接作用于东道国技术研发环节,会导致技术非自愿地向东道国扩散,对东道国技术创新带来正面效应。但另一方面,海外研发投资在东道国设立的研发机构会占用东道国的“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对东道国研发具有挤出效应,对东道国技术创新带来负面效应。作者利用构建的技术创新拓展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低技术密度海外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大于溢出效应,会抑制中国技术创新;高技术密度海外研发投资的溢出效应大于挤出效应,会促进中国技术创新。

四、全球投资治理

全球投资治理是指国家间的联合依赖于一系列国际制度和规则,以调控和治理国际投资。在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贸易领域有世界贸易组织,金融领域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然而在投资领域却没有一个有约束力的全面覆盖投资促进、保护、便利和自由化的综合性全球多边投资协定,而以双边投资协定、特惠贸易与投资协定为主体的双边、区域和多边投资协

^① 黄繁华、王晶晶(2014):“服务业 FDI、吸收能力与国际 R&D 溢出效应——一项跨国经验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第 5 期。

^② 孙早、宋炜、孙亚政(2014):“母国特征与投资动机——新时期的中国需要怎样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工业经济》,第 2 期。

^③ 马述忠、吴国杰、任婉婉(2014):“海外在华研发投资促进了我国技术创新——基于互补性检验的实证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第 5 期。

定共存的规则体系。李玉梅、桑百川 (2014)^① 通过梳理国际投资规则的演变过程, 比较分析双边、区域和多边投资协定的差异, 认为当前国际投资规则新的发展趋势包括投资议题强化投资自由化、投资规则上扩大东道国政府的监管权利和政策空间、环境问题和劳工标准问题成为国际投资规则的新内容。

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 王碧珺 (2014)^② 总结了对于全球投资治理体系, 中国有三大诉求。一是降低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投资壁垒。二是保护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安全。三是希望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投资模式得到尊重和认可。当前全球投资治理体系的缺陷为中国参与国际投资治理提供了机遇, 中国需要从一开始就参与到全球投资治理体系的构建中, 发出自己的声音和利益诉求。作者认为, 相对于区域协定, 最佳路径是推进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使之成为构建多边投资框架的范本和平台, 从而撬动多边投资体系的建立。

然而, 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并不容易。李玉梅、桑百川 (2014) 分析了中国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面对的困难, 主要是公平竞争原则、投资权益保护和利益交换。梁勇、东艳 (2014) 则针对文本内容确定和制度调整这两大重点问题进行了分析。在内容确定方面, 作者在投资准入、透明度、国有企业、吸引外资的国家安全和劳动环境这五个方面对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提出了建议。在制度调整方面, 作者认为现有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学层面, 而忽视了对国际与国内的政治制度条件的分析。然而, 这一谈判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过程, 不仅是各方利益集团的平衡过程, 更是决策体制的官僚过程。作者认为中方必须充分研究美方对外经济政策的决策机制及特点, 了解其背后的利益角力。作者预计未来几轮谈判仍会以美方主导为主, 中国应该从全球政治经济布局及中美政治经济关系角度来审视这一谈判, 在“以开放促改革”的总体思路下审慎推进, 并平衡各部门的利益冲突。在具体策略上, 李玉梅、桑百川 (2014) 则建议中国政府提高国际投资保护待遇标准、在国际投资规则中逐步引入企业社会责任条款、扩大政府保护公共利益的政策空间以及参加多边投资协议谈判。

在全球投资治理中, 竞争中立原则是一项值得关注的代表性规则, 涉及国有企业、竞争政策和投资保护等议题。东艳、张琳 (2014)^③ 认为竞争中立原则是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维护其在全球竞争地位的新工具, 是中国所面临的外部新挑战之一。作者采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 以美国在区域贸易投资协定中推动竞争中立原则为例, 分析了其推动新一代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的动因和收益, 探讨了国际经济规则调整和实现的具体路径, 并提出了中国应对竞争中立原则的政策建议。

澳大利亚是中国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但近年来, 中国企业赴澳大利亚投资屡屡受挫, 有关中国投资是否会威胁澳国家安全的疑虑开始在澳国内发酵。郭春梅 (2014)^④ 对比发现, 中澳双方在投资主体、投资规模、投资领域等具体问题上存在认知差异。在投资主体上, 对中国国企业的身份认知成为双方最大分歧点。在投资规模上, 澳方认为中方投资势头过猛, 规

① 李玉梅、桑百川 (2014): “国际投资规则比较、趋势与中国对策”,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第 1 期。

② 王碧珺 (2014): “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国际经济评论》, 第 1 期。

③ 东艳、张琳 (2014): “美国区域贸易投资协定框架下的竞争中立原则分析”, 《当代亚太》, 第 6 期。

④ 郭春梅 (2014): “中国在澳投资受阻的原因及其启示”, 《现代国际关系》, 第 10 期。



模过大。就投资领域而言, 中企对澳投资大量集中于资源领域, 澳因之担忧关键资产被中国控制。作者研究发现, 澳之所以表现出对中企投资的诸多担忧, 与中企投资方式欠妥有关, 也受澳社会心理、政治角力、利益集团、第三方因素等影响。从长远看, 虽然中澳合作前景广阔, 但推进对澳投资无法仅靠企业自身, 国家还应从宏观层面予以协调、引导。

五、其他

2014年国内外学者除了在国际投资的决定因素、对母国和东道国的影响以及国际投资治理这四个领域不断推进研究外, 对于国际投资的适度规模以及绩效评估方面, 也有较为典型的研究成果。

(一) 适度规模

一般而言, 在判断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适度规模时依循的是英国经济学家 Dunning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 (IDP)。该理论认为一国的净国际投资规模受到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并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乔晶、胡兵 (2014)^① 在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过度抑或不足时并未延续这一分析路径, 而是基于 2003—2011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 运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中国投资的前沿水平以及实际投资相对于前沿水平的偏离程度。作者发现, 近年来蓬勃发展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整体表现为投资不足而非投资过度, 各洲投资不足严重程度不同, 双边投资协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投资不足问题。

(二) 绩效评估

如何评估国际投资 (跨国并购) 这样一个高度复杂的经济活动的绩效及其影响机制是学术界非常关心的问题。目前学者们普遍采用事件研究法及会计研究法进行绩效评估。事件研究法主要是通过并购事件引发股票市场上的异常回报率 (Abnormal Return) 来衡量并购绩效。会计研究法主要看的是企业财务数据。这两个方法都各有缺陷, 都较难兼顾跨国并购活动的高度复杂性以及跨国并购前后投入及产出的价值效应。倪中新、花静云、武凯文 (2014)^② 以 2007—2010 年中国 A 股上市企业发起的 134 起海外并购案为例为样本, 采用 DEA 数据包络技术的二阶段模型进行绩效评估, 并综合考察了国际外部环境及内部环境因素对绩效的影响作用。作者发现, 中国海外并购的效率整体上呈现弱势状态, 国别政治制度环境、文化差异、国家竞争力显著影响中国企业并购价值的取得。

土地投资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 但土地是较为特殊的资源, 涉及一国的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在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国家的土地投资行为受阻, 如韩国将马达加斯加作为其粮仓的项目由于被贴上“新殖民主义”的标签而被迫停滞; 中国中坤集团对冰岛的土地投资因冰岛国内党派纷争而屡屡受挫等。现有文献中系统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土地成败的影响因素

^① 乔晶、胡兵 (201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过度抑或不足”,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第 7 期。

^② 倪中新、花静云、武凯文 (2014): “我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成功吗?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国际贸易问题》, 第 8 期。

的文章非常少。周海川 (2014)^① 利用国际非营利组织 GRAIN 的土地投资数据, 分析了外商投资土地行为成败的因素。作者发现, 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会影响土地投资交易的成功率, 两国政府间的土地投资协议有利于投资者在东道国开展土地投资并且在制度环境质量好的东道国表现更为显著。“中国因素”不利于我国投资者进行海外土地投资, 并且“中国因素”与土地面积耦合在一起影响土地投资成功率, 土地面积越大, 投资越难成功。

六、总结

2014 年国际投资领域国内外学术研究, 在微观上更加细化, 在宏观上则更多重视制度变量的影响。微观上,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方面, 企业异质性应用到了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领域。而对于国际直接投资的国内影响, 尤其是对生产率的影响方面, 文献更加注重选择适当的对照组企业, 以区别投资前的“自选则效应”还是投资后的“生产率效应”。此外, 文献还进行细分不同类别投资的影响, 例如研发机构、制造机构、营运机构、贸易机构等。宏观上, 在传统的用国别数据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及其决定因素框架下, 制度变量得到更多的重视。同时, 全球投资治理日益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

未来的研究中, 将持续解决现有研究的缺陷和有争议之处。继续关注制度方面的影响, 除了传统的政府效率、法治水平、腐败控制等制度性因素的研究外, 会考察更多其他维度的制度变量, 例如金融制度、投资风险等。而不同市场进入模式或市场进入策略 (例如绿地和并购) 对国际直接投资的绩效和影响产生的差异性影响也有较多进一步展开的空间。

参考文献

1. Baltabaev, B. (2014).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New Macro-evidence. *The World Economy*, 37 (2), 311-34.
2. Mijiyawa, A. (2014). Reforming Property Rights Institu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n FDI Inflows Help? *The World Economy*, 37 (3), 410-33.
3. Nwaogu, U. & Ryan, M. (2014). Spatial Interdependence in US Outward FDI into Africa,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The World Economy*, 37 (9), 1267-89.
4. 陈丰龙、徐康宁 (2014): “经济转型是否促进 FDI 技术溢出: 来自 23 个国家的证据”, 《世界经济》, 第 3 期。
5. 陈海波、张悦 (2014): “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区域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空间面板模型”, 《国际贸易问题》, 第 7 期。
6. 陈景华 (2014): “企业异质性、全要素生产率与服务外包直接投资——基于服务业行业和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 《国际贸易问题》, 第 7 期。
7. 陈景华 (2014): “中国 OFDI 来源的区域差异分解与影响因素——基于 2003—2011 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第 7 期。
8. 陈俊聪、黄繁华 (2014): “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结构优化”, 《国际贸易问题》, 第 3 期。
9. 陈涛涛、柳士昌、顾凌骏 (2014): “赢得机遇的关键在于应对国际环境的挑战——基于投资欧洲的实践”, 《国际经济评论》, 第 1 期。
10. 戴翔 (2014): “生产率与中国企业‘走出去’: 服务业和制造业有何不同?”,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第 6 期。

^① 周海川 (2014): “政府协议、制度环境与外商土地投资”, 《财贸经济》, 第 8 期。

11. 东艳、张琳 (2014): “美国区域贸易投资协定框架下的竞争中立原则分析”, 《当代亚太》, 第 6 期。
12. 董有德、孟醒 (2014): “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国内企业创新能力——基于我国分价值链数据的检验”, 《国际贸易问题》, 第 9 期。
13. 付海燕 (2014): “OFDI 对中国国际收支影响的机理与实际测算”, 《统计研究》, 第 12 期。
14. 谷本正幸、王雅琦 (编译) (2014): “中国不再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首选地”, 《国际经济评论》, 第 2 期。
15. 郭春梅 (2014): “中国在澳投资受阻的原因及其启示”, 《现代国际关系》, 第 10 期。
16. 郭进、徐盈之、王书斌 (2014): “FDI 区位变迁与制造业区际转移——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国际贸易问题》, 第 10 期。
17. 韩剑、徐秀军 (2014): “美国党派政治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 8 期。
18. 何兴强、欧燕、史卫、刘阳 (2014): “FDI 技术溢出与中国吸收能力门槛研究”, 《世界经济》, 第 10 期。
19. 胡兵、邓富华 (2014): “腐败距离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观和行为学的整合视角”, 《财贸经济》, 第 4 期。
20. 黄繁华、王晶晶 (2014): “服务业 FDI、吸收能力与国际 R&D 溢出效应——一项跨国经验研究”, 《国际贸易问题》, 第 5 期。
21. 冀相豹 (2014): “地区政务服务水平对我国 FDI 区域分布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国际贸易问题》, 第 4 期。
22. 冀相豹 (201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制度的视角”, 《国际贸易问题》, 第 9 期。
23. 贾妮莎、韩永辉、邹建华 (2014): “中国双向 FDI 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国际贸易问题》, 第 11 期。
24. 蒋冠宏、蒋殿春 (2014): “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生产率进步”, 《世界经济》, 第 9 期。
25. 蒋冠宏、蒋殿春 (2014):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 《经济研究》, 第 5 期。
26. 李平、季永宝 (2014): “政策导向转化、要素市场扭曲与 FDI 技术溢出”, 《南开经济研究》, 第 6 期。
27. 李晓钟、王倩倩 (2014): “研发投入、外商投资对我国电子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影响比较——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与分析”, 《国际贸易问题》, 第 1 期。
28. 李玉梅、桑百川 (2014): “国际投资规则比较、趋势与中国对策”,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第 1 期。
29. 刘朝、韩先锋、宋文飞 (2014): “环境规制强度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互动机制”, 《统计研究》, 第 5 期。
30. 卢进勇、杨杰、邵海燕 (2014): “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与中国环境污染——基于 249 个城市数据的分位数回归分析”, 《国际贸易问题》, 第 4 期。
31. 罗军 (2014): “研发投入门槛、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创新能力——基于门槛效应的检验”, 《国际贸易问题》, 第 8 期。
32. 马述忠、吴国杰、任婉婉 (2014): “海外在华研发投入促进了我国技术创新——基于互补性检验的实证研究”, 《国际贸易问题》, 第 5 期。
33. 毛其淋、许家云 (201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抑或抑制了企业出口?”,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第 9 期。
34. 毛其淋、许家云 (2014):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 《世界经济》, 第 8 期。
35. 毛其淋、许家云 (2014): “中国外向型 FDI 对企业职工工资报酬的影响: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经验分析”, 《国际贸易问题》, 第 11 期。
36. 倪中新、花静云、武凯文 (2014): “我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成功吗?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国际贸易问题》, 第 8 期。

37. 庞明川、韩国高、刘婧 (2014): “入世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直接投资下降影响因素分析”, 《财贸经济》, 第5期。
38. 乔晶、胡兵 (201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过度抑或不足”,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第7期。
39. 随洪光、刘廷华 (2014): “FDI 是否提升了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来自亚太、非洲和拉美地区的经验证据”,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第11期。
40. 孙早、宋炜、孙亚政 (2014): “母国特征与投资动机——新时期的中国需要怎样的外商直接投资”, 《中国工业经济》, 第2期。
41. 覃毅 (2014): “企业异质性、所有制结构与 FDI 技术外溢——来自微观层面的证据”, 《财贸经济》, 第3期。
42. 谭之博、赵岳 (2014): “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 金融发展的影响”, 《金融研究》, 第9期。
43. 汪文卿、赵忠秀 (2014): “中非合作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贸易、直接投资与援助作用的实证分析”, 《国际贸易问题》, 第12期。
44. 王碧珺 (2014): “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国际经济评论》, 第1期。
45. 王建平 (2014): “‘走出去’战略对我国文化产业影响的实证研究”, 《管理世界》, 第12期。
46. 王恕立、向姣姣 (2014):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不同投资动机的经验分析”, 《国际贸易问题》, 第9期。
47. 王喜、赵增耀 (2014): “FDI 与区域资本流动: 抑制还是促进”, 《国际贸易问题》, 第4期。
48. 王永钦、杜巨澜、王凯 (201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 制度、税负和资源禀赋”, 《经济研究》, 第12期。
49. 肖慧敏、刘辉煌 (201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了企业效率吗?”, 《财贸经济》, 第5期。
50. 许和连、邓玉萍 (2014): “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源环境绩效的实证研究”,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第1期。
51. 严兵、张禹、韩剑 (2014): “企业异质性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江苏省企业的检验”, 《南开经济研究》, 第4期。
52. 颜银根 (2014): “FDI 区位选择: 市场潜能、地理集聚与同源国效应”, 《财贸经济》, 第9期。
53. 姚树洁、冯根福、王攀、欧境华 (2014): “中国是否挤占了 OECD 成员国的对外投资?”, 《经济研究》, 第11期。
54. 叶娇、王佳林 (2014): “FDI 对本土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江苏省面板数据的实证”, 《国际贸易问题》, 第1期。
55. 叶生洪、盛月、孙一平 (2014): “外资并购对提高工人工资的影响研究——基于制造业企业的分析”, 《国际贸易问题》, 第12期。
56. 余官胜、袁东阳 (2014): “金融发展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助推器还是绊脚石——基于量和质维度的实证研究”, 《国际贸易问题》, 第8期。
57. 岳咬兴、范涛 (2014): “制度环境与中国对亚洲直接投资区位分布”, 《财贸经济》, 第6期。
58. 张海波 (2014):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的影响——基于跨国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国际贸易问题》, 第2期。
59. 赵德昭 (2014a): “FDI 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门槛效应吗”, 《财贸经济》, 第11期。
60. 赵德昭 (2014b): “FDI、第三方效应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空间集聚——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检验”, 《南开经济研究》, 第6期。
61. 周海川 (2014): “政府协议、制度环境与外商土地投资”, 《财贸经济》, 第8期。
62. 周经、张利敏 (2014): “制度距离、强效制度环境与中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 《国际贸易问题》, 第11期。

(编辑: 曹滔)